

中国近代史史科学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三年四月

## 目 录

- 一、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节录)..... 荣孟源 3
- 二、关于史料的鉴别(节录)..... 荣孟源 12
- 三、论考据..... 荣孟源 30
- 四、内阁大库——清代最重要的档案库(节录)..... 李鹏年 43
- 五、明清档案丛谈(“档案名称渊源初探”等两则)  
..... 单士元 49
- 六、谈清实录和清史稿..... 陈象恭 54
- 七、《清史稿》出版说明(1977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60
- 八、评《清史稿》..... 方国瑜 63
- 九、清国史稿与《清史列传》(节录)..... 王钟翰 67
- 十、清代官修的外交档案资料汇编  
——《筹办夷务始末》..... 何双生 刘德麟 82
- 十一、《光绪朝东华录》出版者说明(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93

- 十二、关于《经世文编》 钱实甫 95
- 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档案  
—— 特别介绍《四国新档》与《办理抚局档案》107  
(日)坂野正高
- 十四、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清人年谱知见录》)(节录)131  
来新夏
- 十五、日记是宝贵史料 陈左高 151
- 十六、明清野史笔记概述(节录) 谢国桢 156
- 十七、笔记中的史料 徐汉华 169
- 十八、太平天国文献学简论 祁龙威 176
- 十九、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节录) 温济泽 189
- 二十、辛亥革命文谈 阿 英 197
- 

(完)

##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

### ( 节 录 )

荣 孟 源

### 二 我国史科学的发展

在没有史学的时候，自然没有史料学。从史学出现开始，为了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史料学也就出现了。孔丘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后人对于“文献”的解释，各有不同：汉郑玄说：“献犹贤也。”（何晏《论语集解》）宋马端临说：文是经史、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的奏疏、诸儒的评论、名流的燕谈和稗官的记录。（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清焦循说：文是典籍，献是贤士大夫的记述。（焦循《论语正义》）清徐灏说：“载诸典籍者文也。传诸其人者献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却都说“文献”就是文字史料和口碑史料。公元前五世纪孔丘提出了叙述历史要依据史料，应是我国史料学的开始。

秦汉以后，历史著作日渐增多，史料问题日渐被人重视。六世纪时梁刘 提出：

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必阅石室，启金匱，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盖

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  
实理，传闻而欲讳其事，求远而欲详其迹。  
于是弃同即异，穿凿谤说，旧史所无，我  
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

我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刘勰《文心雕  
龙·史传篇》)。就是说，叙述历史要依据丰富的史料；实事求  
是的信史，不能用可疑的史料；严厉斥责穿凿附会的滥用史料。  
刘 的话很简单，却提出了史料学上的重要问题。

唐代史学进一步发展，八世纪初<sup>刘</sup>知几撰史学专著《史通》，  
对于史料学的论述更为详细。其中《采撰篇》主要是议论史料问  
题，提出：撰写历史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广泛地搜集  
史料。使用史料必须辨别真伪，反对“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辨别史料必须根据作者的观点和著书目的来分析研究。例如对于  
沈约的《晋书》和《宋书》，要注意他“于晋则故造奇说，于宋  
则多出谤言”。对于魏收的《魏书》，要注意他“党附北朝，尤  
苦南国”。至于“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  
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总之，刘知几进  
一步提出了史料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

宋、元、明、清一千年间，搜集史料和考订史料的工作日益  
发展，编辑了许多当时的文献，搜集了许多古代的金石和文件，  
辑出了许多古代的逸书，研究了许多古籍的真伪及版本源流，辨  
别了许多记载的是非，订正了许多文字以及解释的错误，还总结  
出许多辨别各种史料以及考订和校勘的方法。特别是清代，史料  
学上的成绩是空前的，对于今后研究历史科学有很大的帮助。但

是这种史料学是为封建主义的史学服务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刘知几曾经很坦率地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史通·曲笔》）一遇到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利的史料，为了封建主义的“名教”，即为了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不惜抹杀或者歪曲事实。这样的史料学不是科学。

近百年来，我国的史料学又吸收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在搜集和研究古代史料或近代史料方面，树立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史料学的旧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史科学本来都有消极的一面，即为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惜歪曲事实。中国资产阶级为其阶级性所限制，是不能摆脱这种消极面的。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已经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一定的联系，自然而然就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史学和史料学，阻碍着我国史料学向科学方向前进。自从胡适之类公然贩运西方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史学和史料学进口以来，一些要求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也跟着呐喊，什么“史学本是史料学”，什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些谬论弄得史学界乌烟瘴气，破坏着历史科学，也危害着史料学。

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起历史科学，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史料工作。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毛主席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

来。”（《实践论》）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详细地指导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农村调查序言》）遵循革命导师的教导来进行史料工作，就要搜集十分丰富的材料，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寻找合于实际的材料：不仅研究材料的外部形态，而且要研究其内在联系；不是用一般的形式逻辑来进行工作，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工作。这样就把史料学提高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科学的史料学和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史料学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它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为历史科学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和编辑史料各方面都坚持科学的原则，反对为地主阶级的“名教”、为资产阶级的赚钱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伪造篡改史料的旧史料学。

第二，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一二一页）马克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研究历史规律的关键，并不是要到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而是要到每个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社会的经济中去探求。（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史料工作者首先应当搜集、研究和编辑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史料，劳动群众底史料，各国人民底史料。反对只重视帝王将相底个人活动，只重视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的旧史料学。反对各式各样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旧史料学。

第三，它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法则。“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矛盾论》）依靠唯物辩证法来搜集、研究和编辑史料，就要弄清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具体的工作中，就要抓紧各个历史问题中最主要方面的史料，在许多材料中要寻求最典型的史料，对于



史料要按照时间、地点和条件进行具体地分析。那就要反对不分轻重、兼收并蓄，以多为功、罗列材料的旧史料学；那就要反对玩赏孤本秘笈，刺探生活隐私，堆积奇闻，旨在求异的旧史料学；那就要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形而上学来对待史料的旧史料学。

第四，它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列宁选集》第二卷五八七页）因为史料是阶级斗争的实物和记录，史料工作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原始公社的史料在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手中也要给以歪曲和篡改，所以搜集、研究和编辑史料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有一位多年从事史料工作的人很有体会地说道：“以我个人来说，从前只知道详细占有材料，也未尝不知道有计划的抓住要点和重点，却缺乏一个主要方法，就是不知道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因此，虽然积累的史料非常之多，而其结果，却未能发挥多大的效果。”（金毓峯《静悟室日记》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条）其实旧史料学何止“未能发挥多大的效果”，有时还可能以伪乱真，颠倒是非。史料工作要完成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把过去被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所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就必须遵循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反对一切客观主义的旧史料学。

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与旧史料学有这几点区别，就把史料工作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只有这样的史料学才能为历史科学提供十

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材料，才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

历史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和揭示发展的规律。史料学的任务是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和编辑史料，为历史科学服务，两者是不能分离的。但是历史科学和史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又是不能混淆的。

历史科学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工作，“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实践论》）不言而喻，历史科学在充分占有材料方面，要依靠史料学。

但是，搜集史料并不就是史学。前汉“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遗文古事是史料，不是史学。把这些史料搜集起来都集中到太史公的手里，仍然是史料而不是史学，直到司马迁利用这些史料来撰写《史记》，才是史学。后汉“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史通·史官建置》）图籍是史料，不是史学。把这些史料搜集起来都集中到东观里面，仍然是史料而不是史学。直到刘珍、班固等人利用这些史料撰写《汉记》，才是史学。搜集史料只是为史学准备十分丰富的材料，辅助史学工作，并不能代替史学。

其次，研究史料并不是史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辨别了许多不同的历史记载，确是研究史料，并不是史学。根据所研究的史料来撰写《资治通鉴》，那才是史学。胡应麟撰《四部正》，辨别古籍记事的真伪和后人解诂的错误，也是研究史料；却都不是古代史，只是为撰写古代史提供史料。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以及一切辨别文献真伪、记事真伪和文字正误等等著作，都是研究史料，对于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却都不是历史。研究史料只是为史学准备合于实际的材料，辅助史学工作，并不能代替史学。

其次，编辑史料并不就是史学。编辑一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选集》，为研究明清江苏一带的经济和文化提供材料，并不是明清江苏一带的经济史或文化史。编辑一部《徐树铮屯稿》，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提供材料，并不是北洋军阀史。编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中国近代史上各个专题提供材料，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也不是任何一个专题的历史。编辑史料是把所搜集和研究过的史料汇集在一起，辅助历史科学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并不能代替史学。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导人们研究时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时说过：“这样系统的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教科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

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毛主席《研究沦陷区》）

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来进行史料工作，据我的了解是：历史科学的研究要依靠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不等于历史科学，史料学更不能代替历史科学。史料学是辅助历史科学来搜集史料。研究史料和编辑史料，为历史科学服务。在具体的工作中，史料学有自己的任务，有自己的特点，和历史科学有所区别，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史料学不能离开历史科学而独立存在，史料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历史科学服务，那就成为盲目的工作，成为有闲阶级的玩骨董，而不能成为史料学了。应该说，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

（原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

1979年第7期）

## 关于史料的鉴别(节录)

荣孟源

### 一、鉴别的传统

史料工作一开始就是鉴别史料。如果没有一番鉴别，在搜集史料时，根本无法进行工作。史料收集到手之后，更须仔细考据，提供给历史科学研究者利用。考据工作包括：鉴别史料、考订记事、校勘文字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联的，互有影响，不便分割。

鉴别史料，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时期，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传说。

随着史学的发展，鉴别史料的工作日益深入。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等人，曾经考察文献的真伪，考察作者姓名和著作的时间、地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有人编著古器物图谱，如梁元帝的《碑英》、顾恺之的《钱谱》、虞苏的《鼎录》、陶宏景的《古今刀剑录》，等等。这些书籍今多亡佚，但是这些事例证明了魏晋南北朝的鉴别史料工作比较两汉进步。

隋朝的何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而且还能仿造。唐朝的刘蛻曾经揭穿裴休所珍藏的齐桓公铁盃是“近世矫作”。司马贞根据“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考证《史记·高祖本纪》“母曰刘媪”，认为“媪”应作“媪”，盖刘邦之母姓媪。隋唐时期鉴别史料的工作，又较前进步。

宋朝以来，各种古器物的图谱和研究古器物、古文献的著作

相继刊印，在鉴别史料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了明朝，对于鉴别各种史料，都提出了一些相当完备的方法。例如洪武年间，曹昭撰《格古要论》，"以辨识器物。使玉、石、金、珠、琴、书、图画、古文、异材，莫不明其出处，表其指归，而真伪之分了然在目；凡诈伪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谓有益于世矣。"

(舒敏：《新增格古要论序》)而后舒敏、王佐相继增补，不仅增加了古器物的目录和"传国玉玺、功臣铁券、教令、服带、紫金鱼袋与夫民生耕织之事，宋元宫殿之制"(王佐：《新增凡例》)，而且说明了历代纸张、绢素、铜器、石器、瓷器、漆器等等制作的沿变和诰敕体式的沿变，还揭露了一些伪造旧铜器、旧字画等假古董的方法。又如万历年间，胡应麟撰《四部正伪》，举出十几种制造伪书的情况，考察出许多伪书的作者、时间和传播源流，还总结出辨别伪书的方法。

从宋到清，研究各种古器物、古文献，逐渐形成为专门学科，在鉴别真伪和年代等等方面都掌握了一些规律。乾隆、嘉庆之际，考据学大盛，在鉴别史料，考订记事、校勘文字各个方面都创造了空前的成绩。

鸦片战争以后，史前期的遗物和遗址、甲骨文、钟鼎彝器、汉简、敦煌写本以及明清档案等等史料的发现和发掘，整理史料工作又有新的成绩。因为研究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人对于边疆的历史和史料，对于中外交通的历史和史料，对于外文中有关中国的史料等等特别注意收集整理，创造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史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史料。

五四运动之后，以胡适为首的买办们贩运来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史学，公然叫嚣"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是鉴别史料的绊

脚石，是历史科学的死敌，必须予以肃清。

自从中国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以来，史料工作日渐发展。他们继承我国两千年来鉴别史料的传统，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鉴别史料的主要任务是：鉴别史料的真伪、作者、时间、地点和用途，以及史料的阶级性和它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等等。

### 三、来源

鉴别史料首先要考察其来源，即考察其原始出处和保存、流传的过程。查清了来源，才容易确定史料的真伪、作者、时间、地点和用途等等问题。以《聊斋志异》稿本为例，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时，《出版说明》只说：“是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西丰解放后，检查土地改革工作时在一贫农家中发现的。”这很使人怀疑：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其手稿为什么会到了辽宁西丰呢？后来，在金静庵《静悟室日记》中，看到他在1933年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本的一段记载，才解决了这个疑问。原来蒲松龄的七世孙蒲国权由淄川移居沈阳万泉河侧，携来《聊斋志异》原稿八册和《聊斋文集》等物。在沈阳损失《聊斋志异》一半，故仅存四册。其九世孙蒲英灏移居西丰县，所以又把原稿带到西丰。《聊斋志异》稿本的来源清楚了，就可以完全相信影印本确是蒲松龄的真迹。

首先考察原始出处，不论公私所存或商人售卖的史料，都要从这里考察起。其次，考察保存过程。史料总有一个保存过程。弄清这个保存过程，也就找到了原始出处。再次，考察传抄或翻

印的源流。史料经过传抄或翻印，不止文字上会出现舛误；而且会被窜改，混乱了时间、地点和作者姓名，甚至掺入伪造品。

最后还要指出，考察史料来源，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材料出于哪一阶级之手，经过谁来保存，谁来发表或翻印，在产生材料时期和发表材料时期这份材料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起着什么作用等等问题，都须考虑到。

### 三、制 作

鉴别古代史料要考察其制作的原料和技术，因此辨别历代纸、绢、铜、磁等等制作的沿变成为专门学科。鉴别近代史料同样要从制作方面来考察。

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史料都要考察其制作，但是有些史料必须这样考察才能鉴别。例如《三元里平英团旗》，原是三元里更练馆所保存的，从来源上说，无可怀疑。从形式上说，这面三星黑旗和史籍著录的七星黑旗略有不同；可能是著录有误，此旗基本上可以相信。但从制作上来考察，此旗是洋布用缝纫机制作的，它的制作年代和真实性使人怀疑。1841年可能有洋布输入三元里，但缝纫机在伦敦排挤手工业工人是1864年前不久的事情，它不能于1841年前在三元里应用。广州市人民政府为此于1951年6月在三元里召开座谈会，查清了平英团原是使用北帝庙的旗，而后此旗由更练馆保存。“因乡中武力全付托更练，保卫治安，历代相传，凡是出队必以此为标志，烂了再造，式样百年来未改。”这就可以确定现在这面旗是后日仿造的，式样和平英团当年所用者相同。



广西有专门伪造太平天国“文物”的某父子二人，伪造了许多东西，流毒很广。所谓庚戌年的《圣库收据》就是出于此人之手。1961年刊于《文物》第一期封面。该收据只有庚戌年。无月日；盖一方“洪”字印，没有接收财物的机关。来源不清，使人怀疑。去年又听说，此件在装裱时，“洪”字印的红印色竟然散开了，不象百年前的旧物，很象刚制造不久的新东西。据此，可以肯定这是一件伪造品，不能用为史料。

总之，制作史料的原料和技术，一时一地各有特点。考察这些特点，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以及其制作的时间和地点。例如马兰纸的书报文件，总是1941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的东西；嘉乐纸的书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东西；大花脸的山西票（印刷极模糊，人民叫它大花脸），是阎锡山1938年以后在克难坡制造的。不过，今天我们史料工作者对于制造史料的原料和技术知道的太少了。遇到问题，只能向各行的专家请教；同时，也应努力钻研这个项目。

#### 四、形 式

鉴别古代史料，经常要考察其形式是否合于当时当地的制度，考察其形式是否合理。鉴别近代史料，也要使用这个方法。不能说形式上一有异同，立刻就能判断史料的真伪，但是确实有许多资料可以根据形式来鉴别。例如木版书而用硬皮洋装，总是过去教会学校或力求全盖西化的机关所保存的。装订线在左边；而每页排版却是由右向左的蹩脚书，总是洋教堂所印刷的。这一类的书籍，多是一看形式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和保存经过。鉴别其它